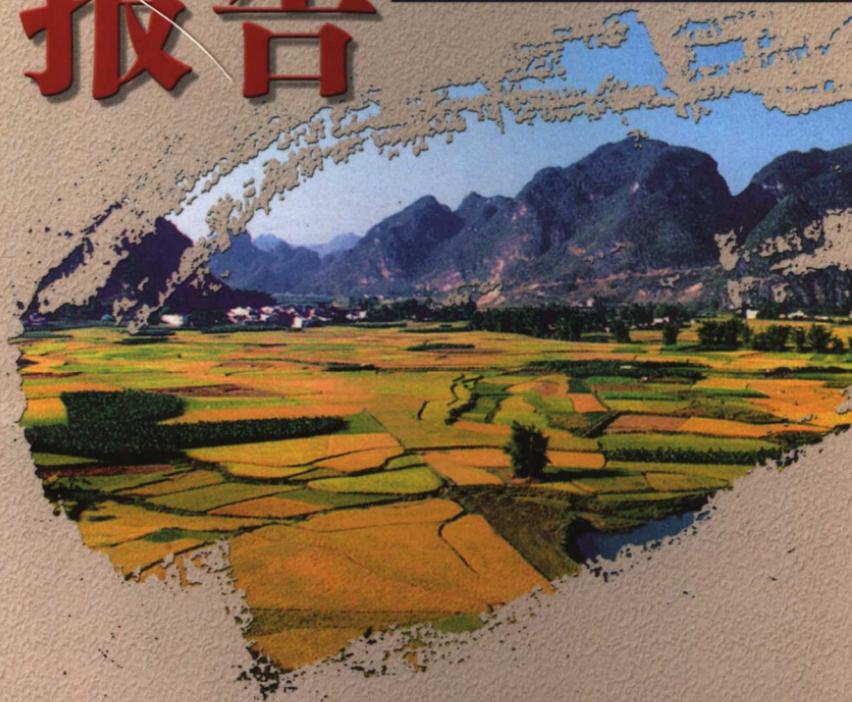


田野 报告

张有隽 主编

TIANYE BAOGAO WENHUA ZHUXIANG DE TANSUO

文化诸相的探索



广西民族出版社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 2004 届硕士生学位论文汇编

田野报告
文化诸相的探索

张有隽 主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野报告 文化诸相的探索/张有隽主编.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363-5275-9

I. 田… II. 张… III. 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7720 号

TIANYE BAOGAO WENHUA ZHUXIANG DE TANSUO

田野报告 文化诸相的探索

张有隽 主编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地址: 南宁市桂春路 3 号 邮政编码: 530028)
发行电话	(0771) 5523216 5523226 传真: (0771) 5523246
E-mail	CR@gxmzbook.cn
责任编辑	覃祥明
特约编辑	何康华
封面设计	王盛勇
版式设计	玉荣奖
责任校对	覃香
责任印制	韦秀美
印 刷	姜为民
规 格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
印 张	850×1168 1/32
字 数	12.25
版 次	330 千字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数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1~1000 册

ISBN 978-7-5363-5275-9/C · 283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771) 5879566

出版说明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是广西区级重点建设学科和一级学科，学校一贯重视教学和科学研究。为了积累成果，保存资料，总结、交流经验，推动学科建设，在编辑出版 2002 届、2003 届硕士生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继续汇编出版 2004 届硕士生学位论文。由于水平有限，本书错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6 年 9 月

序

张有隽

本书是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院民族学专业几位硕士生学位论文汇编。我很高兴担任这本文集的主编，并写几句话以为序。

吕俊彪等几位硕士生专业虽同而方向不同，就是说，他们攻读的都是民族学专业，但研究方向并不一样。其中，吕俊彪、杨丽云研习民族经济——我称之为经济人类学方向（以别于国内某些学者建构的“民族经济学”）；潘艳勤、潘岳研习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诸民族历史文化比较研究方向；农辉锋研习文化人类学方向。这几个方向都是1998年申报民族学硕士专业点时被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了的，从1999年开始招生，到2006年已招收了八届硕士生，毕业了五届学生。现在，民族经济（经济人类学）方向已于2005年被批准为新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吕俊彪等几位同学的毕业论文写得怎么样，可以从他们的专业方向予以评价。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是广西区级重点建设学科，专业师资力量雄厚。老师们按照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要求，严格训练学生。其中，专业理论基础的夯实和田野调查技术的训练及毕业论文写作这三项功底最被强调。老师们带学生各有招数，且团结合作。学生们不囿于门户之

见，在师从自己的导师的同时，还拜访其他老师或研修其他老师开设的课程，多方面获取讯息，扩大知识面，加深对专业理论的理解和把握。这已成为专业教学和科研的优良传统。吕俊彪等几位同学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他们在三年修业期间，克服困难，刻苦钻研，努力探索，勇于创新。他们完成的这几篇论文，就专业水平而论，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1）选题新颖，有意义；（2）田野工作做得扎实；（3）文章内容丰富、细腻；（4）都注意做好文献回顾，了解研究前沿；（5）深入微观研究的同时，不失宏观把握；（6）理论上各有创见，补充了新知。

分别而言，吕俊彪、杨丽云的两篇论文属于经济人类学方向的研究成果。吕俊彪的《性别与生计——山心村京族人家庭生计中的性别分工研究》讨论的是生计中的两性分工话题。文章以广西东兴市京族社区为例，透过田野资料的详细搜集和仔细分析，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存在于京族社会中的“女当家，男做主”的分工方式，是一定自然环境、人的生理状况、社会制度与族群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作者认为，家庭两性分工表面上是劳动力资源的一种配置形式，具有谋求经济利益的功能，然而只有在实存的族群文化中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这一理论观点道人之所未道，有创新意义。杨丽云的《中国农村天主教徒互惠行为研究——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江洲村为例》一文，提供并仔细分析了中国壮族农民改信天主教后，如何将中国传统互助互惠行为与天主教信仰及慈善行为巧妙地结合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的鲜活实例，探讨了壮族天主教农

民互惠制度的驱动力、运行规则、文化意义及其变迁。论文说明，波朗尼关于互惠交换方式在中国改信天主教的壮族农民的经济生活中不但可以得到验证，而且有补充和演进。论文不但有学术意义，还有现实意义。

潘艳勤和潘岳两人作的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潘艳勤的《布岱人的“葬桥”仪式与“不落夫家”——以中越边境两侧上、下其逐屯为例》一文，对广西龙州县中越边境两侧上、下其逐两屯“葬桥”仪式与“不落夫家”关系作比较研究，田野工作做得很扎实，资料搜集很细腻。她把中国壮族布岱支与越南岱族民间“不落夫家”和“葬桥”仪式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前的学者研究壮族“不落夫家”习俗，多半从历史文献中找资料，田野调查不是被忽视，就是很粗疏，因而对壮族妇女“不落夫家”原因的分析多半不到位。至于从“不落夫家”到最后“落夫家”原因和过程的分析说明多显老套和肤浅。潘艳勤的贡献在于，她通过自己仔细的田野调查，第一次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壮族妇女“不落夫家”的原因，是妇女婚后未生育第一胎以前，不管年龄多大，还只是个“孩子”，不是“老人”（成年人），所以不常住夫家，不能归宗于夫家，只有生育了第一胎以后，等于有了后代，这时才应归宗夫家。归宗必须通过“葬桥”仪式，祭告夫家祖先来完成。从此以后，这个妇女就真正成了夫家的人，可以常住夫家（落户夫家）了。而“葬桥”仪式则是当地布岱人妇女的一个人生重要的通过礼仪。说白了，壮族已婚妇女“不落夫家”习俗，至少龙州布岱人的这一习俗，乃壮族解决婚姻、生育

与家族的一个文化建构，并不是过去某些人所说的已婚青年女子为了玩歌圩、耍风流，还没有玩够、耍够，或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抵抗，或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中婚姻形态的残留。潘岳的《汤与药——壮佬两族丧葬仪式比较研究》一文透过壮族、佬族丧葬仪式反映出的宗教信念及实践之异同的比较研究，探讨异同形成的原因，两个民族各自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篇将壮族、佬族宗教信仰放在一起进行讨论、比较分析的论文。作者用“换汤不换药”作比喻，透过壮族和佬族丧葬仪式中保留下来的百越民族文化“味儿”的分析，证明这两个民族有同源的文化底蕴。这篇论文对了解和理解壮、佬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参考价值。

农辉锋的方向是文化人类学，其《从“吞口房”到“平顶房”——宜州“百姓人”家屋文化及其变迁研究》一文讨论家屋文化这一话题。文章详细描述了百姓人建房过程及近年来住房文化的变迁，透过住房、婚礼、出生礼、贺新房等仪式中社会角色的划定，群体互动所彰显的意义，提出了百姓人家屋具有男女同体的象征，同时具有孕育力量的特质。这是有创见的，并补充了国内对民间居住文化研究的不足。

英国和平主义者罗素说，人的一生面临怎么面对环境、他人、自己三大难题。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博士说，人类为了解决与环境的关系创造了技术，解决与他人的关系创造了制度，解决自己的难题创造了信仰。而费孝通先生则说，人类各民族所处的环境（自然的、人文的）有共性又

有差异。因此，文化作为人类适应环境的工具，有共相又有异相。我这里把 2004 届五位硕士生的学位论文用一个总标题《田野报告 文化诸相的探索》概括起来，是因为这五篇文章都是从田野研究中获得，每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技术的、制度的、信仰的）切入，阐述了居住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京族、壮族、佬族、汉族所创造的文化诸相的实例，以及这些文化所包含的共相与异相。透过他们的论文，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多姿多彩。

总起来说，这五篇论文都写得不错。五位同学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通过了论文答辩，顺利地进入了民族学（人类学）殿堂的大门。其中有两位同学还分别考取了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人类学的博士生，有望成为专职人类学家。

应当指出，作为刚入门的年轻人类学研究者，他们总会有不足的地方。我以为，这五篇论文的作者，由于各种原因，有的某方面田野资料的搜集欠细腻、充分；有的理论提升不够；写作技巧方面，理论与资料相互交融于全文这一基本的民族志文本写法，掌握运用不够老道。这些都是有待于今后改进的。

是为序。

写于广西民族大学瑶学斋

2006 年 9 月 21 日

目 录

序	张有隽 (1)
性别与生计	
——山心村京族人家庭生计中的性别分工研究	吕俊彪 (1)
布岱人的“葬桥”仪式与“不落夫家”	
——以中越边境两侧上、下其逐屯为例	潘艳勤 (89)
中国农村天主教徒互惠行为研究	
——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江洲村为例	杨丽云 (155)
从“吞口房”到“平顶房”	
——宜州“百姓人”家屋文化及其变迁研究	农辉锋 (223)
汤与药	
——壮佬两族丧葬仪式比较研究	潘 岳 (314)
后记	(378)

性别与生计

——山心村京族人家庭生计中的性别分工研究

吕俊彪

摘要

人类的经济行为总是沉浸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的制约。性别分工是人类出于生存上的需要而结成的一种人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它的形成固然与一定的生态环境以及人类自身的生物属性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但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的内在影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家庭生计中的性别分工虽然在表象上往往体现为家庭劳动力资源的一种配置形式，具有谋求经济利益的功能，然而只有在实存的族群文化中它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对山心村二、七队京族人家庭生计中的性别分工进行人类学考察，分析这种分工模式形成的各种可能原因及其所潜藏的文化机制，进而探讨性别平等的相对性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调适问题。

Abstract

Human's economic behaviors are always shaped by their cultural environments, since all of them are within it. The laboring divisions of gender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being, nature, and society. It is true that these divisions are formed partly by environments and

human's physical attributes, bu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f an ethnic group are also important aspects. The laboring divisions of gender in family livelihood formally serve as a tool of labor assignment, and the economic profit is one of their pursues; nevertheless, only in a concrete cultural environment can it get its own meaning.

In this thesis, I tried to analyse the causes of laboring divisions of gender in Gin ethnic groups' family livelihood and the cultural law of these divisions. basing on my fieldwork at a village named "Shanxin", I discussed the relativit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adjust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第一章 纲论

一、研究的缘起

20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在当时的广西东兴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今东兴市政府）工作，由于工作上的关系，经常有机会到京族三岛一带以及越南广宁省的芒街镇等地考察。当时京族人的经济生活中有一种现象让我感到十分奇怪，那就是他们在生产（经营）上的男女分工与我所到过的汉族地区迥然不同。我的一些在当地长大的同事，时常指着街道上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京族妇女，对我说她们是如何如何的勤快，做生意是如何如何的了得，而她们的丈夫又是如何如何的懒惰，只顾整天在家里饮酒、喝茶，很少为家里的生计奔忙。这种“男人饮茶，女人做工（干活）”的性别分工现象一度令我大惑不解。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在东兴工作的最初一段时期的那些不解，在人类学的话语中原来叫做“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

我在刚进入广西民族大学学习的时候，对人类学（民族学）的认识还比较粗浅，以为人类学的研究无非就是到一些一般人不便去到的地方，记录一些一般人不易看到的奇风异俗罢了，没有太多的思想内容，所以在入学之初我便跃跃欲试地要筹划我的毕业论文。我当时的看法，是想通过对一个壮族村寨的家庭经济计划的描述来尽快完成它。

然而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的这些想法发生了改变。我逐渐认识到人类学也是要研究现实问题的，它所需要的不只是耐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同样需要智慧。我放弃了入学时关于毕业论文的最初设想。我的思绪遂又回到了当年的东兴和芒街，街头上那些忙碌的身影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之中。我觉得那种“男人饮茶，女人做工”的性别分工模式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人类学研究题材。我带着这些初步的想法分别向我的导师周建新博士以及张有隽、李富强两位教授请教。他们认为可以一试，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性别分工现象可以说随处可见，这是一个看似平常实则隐含着许多文化内容的经济现象。在性别分工问题上，以往的研究众说纷纭，其观点也有着相当的启发性，但由于受到各自学科领域的局限，一些观点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商榷的地方。我想，如果能综合相关学科的观点，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性别分工进行研究，或许会有一个可以拓展的思考空间。

二、学术史回顾

分工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分工就一直存在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演变。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分工大致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社会分工，这种分工被称为“一般的分工”，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发生的；一种是劳动分工，即工场内部的分工，是“个别的分工”，这种分工伴随着劳动的始终，

只要劳动的过程存在，就必然有劳动分工。^①

性别分工是人类最原初也是最普遍的分工形式，它存在于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人类生活中的分工在其最初是“纯粹自然发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② 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看来，男女分工是加强“男女相互依赖状况”的机制，因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一观点虽然曾经受到过极端文化相对论者“女权主义者—修正主义者”（Feminist-Revisionist）学派^③的质疑，但性别分工的普遍性存在仍然基本上得到确认。

1. 分工问题研究的最初理论溯源

较为系统地谈论社会分工问题的当首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柏拉图认为人的多种多样需要的满足以及人的能力的差别是分工产生的根源，分工的本质在于工作的专业化，并由此形成人们之间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同时也带来了生产率的显著提高。^④

亚当·斯密（Adam Smith）更为深刻地论述了分工问题。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开篇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工。他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⑤ 因为有了分工，相同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

^① 荣长海：《论社会分工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40页，1998(4)。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该学派试图从理论上否定性别分工的普遍性，认为尽管不能肯定劳动分工就是大男子主义，但我们永远也不会得出结论，因为评述者的偏见使对比变得无法进行。参见海迪·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载《妇女：最漫长的革命》，51页，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

^④ 解战原：《当代社会分工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⑤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多得多的工作量。^① 在斯密看来，人类最初产生分工是由于人类有着互相交换劳动所得的倾向，他认为分工的诸多利益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而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②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写出专门的著作来论述分工问题，但对社会分工的研究却几乎贯穿于他们的全部理论活动和主要著作。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论证、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工理论。马克思认为，分工体现了物质生产劳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他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词，以分工为形式的异化劳动以及作为劳动异化结果的私有制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③

斯宾塞（H. Spencer）和孔德（A. Comte）在社会有机体论的理论框架内，从整体的统一上研究了社会内部的分化，试图揭示分工与合作的辩证关系，并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阶级划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把人类对社会分工的探索推进了一步。

埃·迪尔凯姆（E. Durkheim）在他的《社会分工论》一书中全面地研究了社会分工的作用、社会分工与道德、社会分工与法律的关系。这位深受斯宾塞影响的社会学家曾经试图证明社会分工不是人类的意志和智慧的产物，而是一种自然界的必然现象。但他最

^①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②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③ 解战原：《当代社会分工论》，65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后又说“分工虽则是自然界的定律”，后来“却渐渐变为社会的基础”，^① 原因在于分工能够增加生产力量，同时又增加工人的技巧，它是社会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发达的必需条件，是文化的源泉。

2. 经济学研究视域中的性别分工问题

(1) 早期经济学的社会性别问题研究

经济学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是较为晚近的事情，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学对于性别问题尤其是女性问题的漠视有关。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 (J. S. Mill) 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 是在经济学发展早期为数不多的关注妇女经济地位的著作之一。在该书中，穆勒对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第二等级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恩格斯在研究 19 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时，将当时家庭中妇女地位低下的现象归结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端。20 世纪初期，旧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 (T. B. Veblen) 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也曾集中叙述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同时期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吉尔曼 (C. P. Gilman) 分析了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和工作对女性的重要性。英国经济学家韦伯 (B. P. Webb) 等人讨论了男女同工同酬问题。^②

(2) 当代主流经济学对于家庭经济中性别分工问题的研究

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家庭经济中性别分工问题上的研究，以著名经济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 (Gary Stanley Becker) 与舒尔茨 (T. Schultz) 等人创立的新家庭经济学最有影响。此外，最近 20 年来在经济学研究中异军突起的博弈论也在家庭经济问题研究上得到了应用。^③

贝克尔擅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分析“非经济问题”，并因此

^① 埃·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② 贾根良、刘辉锋：《女性主义经济学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5)。

^③ 贾根良、刘辉锋：《女性主义经济学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5)。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贝克尔认为，家庭之所以绵延长存，其原因在于家庭生产以明确细致的分工协作为基础。最初的分工发生在已婚男女之间，妇女致力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而男子则专心于狩猎、种田。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分工，部分取决于生理上的差异，但主要取决于经验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上的不同。^①他认为妇女主要在提高家庭效率，尤其是生儿育女的人力资本上投资，而男人则主要投资于提高市场效率的人力资本。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认为家庭中男性居于主导地位，而其他自利的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则依附于男性，服从男性的效用函数。新家庭经济学还引入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妇女在家庭工作上具有先天优势，她们从事家庭劳动的机会成本很低，新家庭经济学据此认为女性和男性在家庭和市场上的分工是效率最高的一种社会分工形式。^②

博弈论在家庭经济的分析中将男女双方置于平等的博弈位置之上，用合作和非合作模型的方法分析了家庭中的合作行为，而男女双方的合作被看成是他们在家庭生活中长期反复博弈的结果。^③

（3）家庭经济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20世纪60年代，一些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经济生活中的性别问题，以女性的视角对经济生活中的性别问题重新进行审视，并对当时的经济学理论中所弥漫着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提出了质疑。这种学术视角的出现，导致了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产生。

女性主义经济学将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社会/文化构成思想引入经济理论研究当中，认为当时居于经济学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

^①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著，王献生、王宇译：《家庭论》，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②贾根良、刘辉锋：《女性主义经济学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5）。

^③贾根良、刘辉锋：《女性主义经济学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5）。